

· 医药文物专题研究 ·

# 先秦秦汉出土医药文物研究概述

张如青<sup>1</sup>, 郑洪<sup>2</sup>, 应艳新<sup>2</sup>

(<sup>1</sup>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 上海 201203; <sup>2</sup>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杭州 310053)

**摘要:** 近百年来, 我国考古出土的先秦秦汉医药文物数量众多, 相关研究已有较充分开展。关于出土医疗用具的研究比较系统全面, 但仍存在缺乏界定标准的问题; 关于出土药学文物的研究, 多从物质性和可能性的角度出发, 也存在是否可供药用的不同意见; 关于涉医汉画像石的研究有一定的成果, 对医药技术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对出土医药文物的研究还需要加强系统性的考察, 并更好地与医史文献研究的进展互鉴。

**关键词:** 医药文物; 出土; 先秦秦汉

DOI: 10.16307/j.1673-6281.2023.03.001

中图分类号: R2-09; K8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6281(2023)03-0201-08

## Overview of Researches on Medical Cultural Relics Unearthed in the Pre-Qin and Qin-Han Periods

ZHANG Ruqing<sup>1</sup>, ZHENG Hong<sup>2</sup>, YING Yanxin<sup>2</sup>

<sup>1</sup>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iti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China; <sup>2</sup>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3, China

**[ Abstract ]** In the last century,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medicinal relics unearthed from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China, involving pre-Qin periods and Qin-Han dynasties, and relevant researches have also been conducted extensively. The researches on medical equipment are relatively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with a lack of defining standards. Opinions on the practicality of drugs in the study of pharmaceutical artifacts differ mo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teriality and possibility. Certain achievements in the research of Han stone carvings related to medicine have been obtained as reference to the study on history of medical technology. So the study of unearthed medical relics still needs to focus on strengthened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to better enhance the progress of researches on medical history literature.

**[ Keywords ]** Medical Cultural Relics; Unearthed; Pre-Qin and Qin-Han Periods

**[ 基金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9ZDA195)

**[ 第一作者 ]** 张如青 (ORCID: 0000-0002-2958-8819), 教授, E-mail: 13564163063@163.com

**[ 通信作者 ]** 同上

出土医药文献与文物是保留和重现我国古代医学发展水平真实而直接的证据,其中先秦秦汉医药文献与医药文物,最真实地呈现了先秦秦汉医学发生发展的原貌,是研究中医学理论渊源与学术发生发展源头最珍贵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广义而言,“出土文物”是指地下(或水下)出土(或出水)的,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和遗迹。因此,出土文献也属于出土文物的范围,但因其研究更多是从文字文献角度来开展,故常常被作为单独类别来对待。狭义的“出土文物”主要指从器物形质角度研究的实物,如出土秦驷病玉版,作为器物的玉版与医药无关,而其上所载字数较多的铭文则与医药密切相关,故归入“出土医药文献”的研究范围。甲骨、印玺等亦同理。再如出土“医工铜盆”,虽其上载有“医工”等铭文,但此铜盆作为熬药器,更具医药文物价值,故归入“出土医药文物”的研究范围。

除医药本体文物外,先秦秦汉时期还有医药遗迹、古尸、卫生防疫等相关文物,学界也有不少研究。本文集中于狭义的“出土医药文物”概念,主要对出土医疗用具、出土药学文物和涉医汉画像石的研究进展进行概述和讨论,在类别上则主要按具体用途进行分类,分述如下。

## 一、出土医疗用具

早期直接应用于医疗的用具主要有砭和针两类,其中砭可能有手术和按摩两种用途,而针从早期形制来说,应该也偏于特定的手术应用,后期才开始出现适用于调气针灸的针具。

### (一) 有关砭石的研究

马继兴等曾对砭石的种类、用法进行梳理,介绍了用于切割的砭石主要有铍形、刀形、剑形、铍形等,归纳了其4项主要功用,即用于熨法、按摩、切割、叩击体表<sup>[1]</sup>。1963年内蒙古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砭石<sup>[2]</sup>,以及台西村商墓中出土的砭镰<sup>[3]</sup>均属此类。被认为属于医用砭石的还有湖北洪湖乌林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1件青灰岩石刀<sup>[4]</sup>,以及河南新郑出土的1件石针,后者被认为可能是用于按摩的器具<sup>[5]</sup>。张入文结合功能用途对医用砭石进行了较为系统完善的分类<sup>[6]</sup>。大多数出土砭石并没有伴随明确的医药对象,因此也有学者指出,要从形制上判定是否属于医疗专用的砭石比较困难<sup>[7]</sup>。往后逐渐出现了金属类的手术用具。典型者如汉代刘胜墓出土的铜手术刀4件,另有斧形水晶砭石2件,其刃部锋利,有外科手术刀特征<sup>[8]</sup>,结合其形制和相关出土信息,对其功用的认定较少有争议。

### (二) 有关针刺用具的研究

出土针灸针具包括骨针、陶针以及金属针,金属针又有青铜、金、银之分。张立东认为考古常见的无孔骨针可能为针灸用具<sup>[9]</sup>,有学者认为上溯到龙山文化时期出土的2枚陶针也属于针灸用具<sup>[10]</sup>,学界对此有不同看法。出土的金属类针具则较多被认为属于医用。《中华医学文物图集》载录了1枚发现于内蒙古达拉特旗的战国青铜砭针<sup>[11]</sup>;叶浓新、钟以林、陈嘉雯等均考证广西武鸣县马头元龙坡M101出土的2枚青铜针为针灸用具<sup>[12-14]</sup>;周言等研究了南京大学所藏的1件载有“吁嗟乎敬”铭文的战国铜锥形器,认为当属割刺用的砭针<sup>[15]</sup>。也有学者持谨慎态度,如陈振中《先秦青铜生产工具》统计出土先秦青铜针共有23件之多,但其具体用途尚待判定<sup>[16]</sup>;伍秋鹏统计出土先秦金属针具共有28件之多,认为仅部分可能用于医疗<sup>[17]</sup>。

汉代墓葬出土了多种基本被认为属于医用的金属针具,主要有广西贵县汉墓出土的3枚西汉银针<sup>[18]</sup>,以及西汉刘胜墓出土的金针4枚、银针5枚<sup>[19]</sup>。另据报道,云南澄江县金莲山古滇墓遗址(战国至东汉)发现铜针和银针共4枚,最细的直径仅0.2 mm,并称“可能改写针灸历史”<sup>[20]</sup>,但未见后续研究。

### (三) 针灸经脉髹漆木人

四川绵阳双包山二号墓经脉漆雕木人和老官山汉墓经穴髹漆木人, 都被认为是对医史研究有重要影响的发现。

1993年, 四川绵阳双包山二号西汉墓出土了1尊木人模型, 体表髹黑漆, 绘有红色线条若干, 发掘简报将之命名为“经脉漆雕木人”。谢克庆等认为该经脉漆木人的出土, 对医学文物、早期经脉学说和四川地区医学的研究有重要价值<sup>[21]</sup>。马继兴对该经脉漆雕木人作了具体介绍和详细考证, 针对经脉数量与循行, 将木人所载19条经脉与其他先秦两汉医籍所载相关内容作了对比研究<sup>[22-23]</sup>, 相关内容收入其所著《出土佚古医籍研究》。其他如刘澄中、何志国、李观荣等围绕该经脉漆木人的定名、形成年代及经脉系统等问题展开探讨, 并有“漆经络俑”“人体经络漆俑”“西汉人体经脉漆雕”“西汉髹漆脉穴木人式”等命名之争<sup>[24-28]</sup>, 对此木人的称呼现今仍不一致。

与双包山经脉漆木人相比, 老官山经穴髹漆木人所载经脉更为丰富, 有红线22条、白线29条, 并有表示部位的“心”“肺”“肾”“盆”等阴刻小字, 出土以来就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目前已有多篇论文围绕该髹漆人像所载经络、腧穴及铭文等进行探讨, 并与老官山出土的其他经脉文献进行对比研究。梁繁荣等主编的《揭秘敝昔遗书与漆人》也设专章对该髹漆木人进行了研究<sup>[29]</sup>。由于老官山髹漆木人详情尚未完全公布, 以上研究对木人的描述不尽相同, 甚至有所抵牾, 对木人性质的判定也尚未统一, 对木人上所载经络、部位(或穴位)名称的考证, 更是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老官山经穴髹漆木人的出土, 也引出双包山经脉漆雕木人以及《素问》《灵枢》《脉经》等医籍相关篇章研究上的新问题。总体而言, 对于出土针灸经脉髹漆木人的研究, 目前尚处于初期阶段。

针灸技术及经穴知识的起源, 是中医理论和临床研究都十分关注的问题。争论较多的说法包括先有经脉还是先有腧穴, 先有灸法还是先有针法等<sup>[30]</sup>。到目前为止, 先秦秦汉时期的出土文物还无法为这些问题提供明确的证据。出土医药文物的不断被发现为了解当时的可能应用情况提供了物证, 研究的积累亦有可能带来新的突破。

## 二、出土药学文物

出土的先秦秦汉时期药学文物包括出土药物、古代药物标本, 以及中药加工、煎熬、制剂、服用、贮藏等相关物品。

### (一) 出土药用动植物及药物标本

在远古遗址经常可以发现后世药用的动植物遗存, 虽然难以认定其当时的“药用”功能, 但对它们的认识和使用可以说是后世发现其药用价值的前提, 如林乾良介绍了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萧山跨湖桥文化遗址和河姆渡遗址中所见大量植物及种籽的遗存, 指出大多属于药用植物。林氏认为, 虽然没有正面、直接的证据, 但也不能完全否认当时人类在食用动植物的过程中发现其医疗功效的可能性<sup>[31]</sup>。又如, 辛智科介绍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麻的果实<sup>[32]</sup>, 而大麻是后世麻醉使用的主要药物之一。对于出土植物作出已属药用推定的有耿鉴庭等对藁城商代遗址中出土的桃仁和郁李仁的研究<sup>[33]</sup>, 以及其对安阳商代墓铜鼎中发现的1枚梅核的分析<sup>[34]</sup>。

1913年, 斯坦因在罗布泊地区的古墓中发现了麻黄, 随后在罗布泊的孔雀河古墓沟墓地、小河墓地等古墓中均出土了麻黄。张海鹏一文列述了学术界关于“墓葬麻黄”原因的说法, 包括保持尸体不腐、生命象征、精灵崇拜等<sup>[35]</sup>。夏雷鸣、王兴伊有研究表明3800年前古墓沟时期的楼兰人已经会使用麻黄治病<sup>[36-37]</sup>。

后世常用的中药花椒在先秦两汉的墓中多有发现，多位学者对其用途进行了讨论。姚智远等认为先秦两汉时期花椒的用途主要有礼神敬神、驱邪避凶、祈子延宗、彰明道德等<sup>[38]</sup>；杨俊峰梳理了河南固始商代墓、河南光山黄君孟夫妇墓、河南光山黄季佗墓等20余座出土了花椒的墓葬，根据这些墓葬的地理范围，推断花椒随葬更多是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楚地的一种葬俗<sup>[39]</sup>。

马王堆一号和三号汉墓出土的随葬药物标本更多，一号墓出土的药物有茅香、高良姜、桂皮、花椒、辛夷、藁本、姜、杜衡、佩兰9种<sup>[40]</sup>。三号墓出土的药物除茅香、高良姜、桂皮、花椒等植物类药物外，还有牡蛎、朱砂等，与同时期医学著作《五十二病方》比对，多为当时常用的治疗药物及芳香辟秽用药<sup>[38-39]</sup>，同时出土的还有羚羊角、乳香、红枣、铅丹等<sup>[41]</sup>。这些药物或放置在尸体手握，或贮藏于椁箱中的香囊、绣枕、竹筒、绢袋里。对其随葬用意，何柞成认为与古代人们佩带辟秽物品的风俗有关，并提出药物是否按照配方装入有待进一步研究<sup>[42]</sup>。由于许多物品可药食两用，不少研究将这类物品纳入药学研究范畴，如张厚墉介绍韩城姚庄坡东汉墓出土的薄荷、薏苡和枣核<sup>[43]</sup>等。

“五石”类药物也是汉代墓葬中出土较多的药物，如1983年发现的南越王墓西耳室中出土的“五色药石”包括紫水晶、硫黄、雄黄、赭石、绿松石，推断南越王国统治者迷信长生、幻想升仙<sup>[44]</sup>；而王维一则认为该五色药石为汉初南越国人治疗虚寒之证的药物<sup>[45]</sup>。王玉清介绍了潼关汉代杨氏墓群M2出土的5个朱书陶瓶，瓶内均装有雄黄<sup>[46]</sup>。唐金裕介绍了西安市和平门外4号汉墓出土的朱书陶瓶中装有汉白玉石1块<sup>[47]</sup>，刘卫鹏认为当是白色礞石<sup>[48]</sup>。咸阳师范学院东汉墓M2中出土有朱书陶瓶1个，其内装有礞石、雄黄、曾青等药物<sup>[49]</sup>，对其随葬用意，刘卫鹏提出为“镇墓”，并非药用。这些出土物品对了解当时药物学状况很有价值。

## （二）经过加工的药用物品

一些墓葬中出土了经过加工（包括酿造）的可供药用或疑似药物的物品。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有黑色扁圆形药丸184粒<sup>[44]</sup>；山东巨野昌邑哀王刘髡墓出土了朱红色丸药150余粒，据检测发现主要成分为代赭石、赤石脂或禹余粮等多种矿物的混合<sup>[50]</sup>。这些丸药是否为丹药或五石散，学界看法不一。此外，南昌海昏侯墓发现了一批条状物，媒体曾报道为“冬虫夏草”，经彭华胜等分析鉴定，发现是经过炮制的地黄，并将其定义为“最早的中药辅料炮制品”<sup>[51]</sup>。这些发现与研究均有助于进一步探讨两汉时期的药物加工情况。

酒在先秦两汉医籍中经常作为药物出现，但它更是常见的生活用品。傅金泉介绍河北藁城商代遗址、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江苏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均出土有酒或酒的残留物<sup>[52]</sup>。这些出土物品可以提供当时酿造工艺的信息，对于认识酒在当时的药用情况也是有意义的。

## （三）出土药物相关器具

出土药物相关的器具，按具体用途可分为盛药器、量药器、捣药器、碾药器、熬药温药器、灌药器、炼丹器等。

### 1. 盛药器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药物均盛放在香囊、绣枕、竹筒或绢袋中，山东巨野红土山西汉墓出土有内盛丸药150多粒的铜鼎以及存放有药物的漆盆（39号、41号），西汉南越王墓出土存放药丸的陶药甌和银药盒，这些均属于一般意义的盛药器。值得关注的还有记载相关文字的盛药器具，如悬泉置出土记载有付子（附子）、熏力（熏陆）等药名的汉代古纸，当是包药用纸<sup>[53]</sup>。王国维、罗振玉《流沙坠简·器物》载录写有“显明隧药函”字样的木板，认为是药函盖，孙机提出药函中所盛的除草药外，“还可能备有丸丹

等成药”<sup>[54]301</sup>。海昏侯墓出土刻有“医工五口汤”字样漆医工盘2件<sup>[55]</sup>，王焯燃等释漆书5字为“医工五禁汤”<sup>[56]</sup>，而魏嘉臻则释为“医工五叶汤”<sup>[57]</sup>，推测这件漆医工盘或为刘贺生前盛放叶汤的养生器具。

东汉墓中常见的解注陶瓶，常盛有一些“神药”，也是一种盛药器<sup>[58]</sup>。解注陶瓶中所盛的“神药”除矿物类外，还有植物类和动物类，有些学者强调这些药物的功能是“辅神”，镇压墓冢<sup>[59]</sup>，并非日常生活中的盛药器。

## 2. 量药器

出土所见的战国至两汉量具中，有些被认为属于量药器。长沙左公山战国墓葬和江陵雨台山535号墓出土的天平，被认为是称量药物的药衡<sup>[4]</sup>。江苏仪征石碑村汉代木椁墓出土铜量器1件，内壁有朱红色痕迹，可能为朱砂<sup>[60]</sup>。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量药器包括铜药量和铜药匙各1件<sup>[19]</sup>。巨野红土山西汉墓出土药匙4件，其中1件柄中部阴刻铭文“八两三朱”<sup>[61]</sup>。河南陕县后川东汉墓出土1件小药量，容积为6 mL，即1方寸匕<sup>[54]300</sup>。这些量药器有助于了解当时的药物使用分量。

## 3. 捣药和碾药器

出土捣药器以药杵和药臼为主，一般二者同时出土，合称为1套，亦有单独出土者。如耿鉴庭等介绍了长沙五里碑一号墓出土的1件西汉铜杵臼<sup>[62]</sup>。和中浚等统计汉代出土的铜铁药杵臼，计有广州西汉南越王墓、江苏仪征石碑村汉代木椁墓等9件（套）<sup>[11]85-87</sup>。刘胜墓也出土有铜捣药杵1件<sup>[19]</sup>，与江苏铜山小龟山西汉崖墓出土的铜药杵<sup>[63]</sup>相似。其他出土的陶、石及金属类杵臼还有很多，但难以判定是否作为制药工具使用。《“一带一路”中医药文物图谱集》收录的先秦两汉杵臼还有陕西医史博物馆所藏的西安十里铺遗址出土石药臼、户县西汉墓出土铁药臼和咸阳北杜出土铜药臼等<sup>[64]</sup>。先秦秦汉时期碾药器较少见，首都博物馆藏有汉代黄褐釉药碾1件<sup>[65]</sup>。

## 4. 其他药用器具

和中浚认为河北满城刘胜墓铜釜和河南孟县韩庄岭“太医”铭文的陶罐均为熬药温药器具<sup>[66]</sup>。有学者认为满城汉墓出土“医工”铭文的铜盆也可能是用来隔水蒸煮药物的医疗专用器皿<sup>[19]</sup>，该墓还出土铜滤药器2件以及银灌药器共3件，形状分别为圆盒形和漏斗形。该墓出土的1件由托盘、浇口和带流勺等构成的三足器，不少研究者认为属于药物冷却器<sup>[67]</sup>。江苏仪征石碑村汉代木椁墓出土铜滤药器1件<sup>[60]</sup>；安徽屯溪西周墓出土的过釉陶漏斗，有学者认为可能也用于滤药<sup>[68]</sup>。另外，其他出土与药物相关的器具还有不少，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和王凯旋《秦汉生活史话》等书中均有收录。

以上药学文物研究很多基于物质性和可能性，也就是说，这些物品从后世知识来看均可供药用，但不一定确证当时就是“药物”或“药用”；即使是，也未明确当时的应用目的是否与后世一致，例如有些墓葬中“药物”被认为用于辟邪。尽管如此，新的发现至少可佐证当时的医药文化观念，有一定意义。

## 三、涉医汉画像石

1972年，刘敦愿对微山县两城山所见4方画像石进行了研究，定名为“扁鹊针灸行医图”<sup>[69]</sup>。其后随着对此类画像石的研究不断深入，叶又新考察了山东微山、济南和嘉祥的10方神医题材的画像石，认为其中既有扁鹊，又有仓公的形像<sup>[70]</sup>；他还据画像石上所刻的医针，对九针的形成使用进行了考证研究<sup>[71]</sup>。罗曼梳理武梁祠10余方与医学相关的画像石<sup>[72]</sup>。除山东外，陕西绥德、安徽萧县等地也出土有医学相关汉画像石，如康兰英等介绍了陕西出土神医题材的东汉画像石<sup>[73]</sup>。除神医题材外，汉画像石涉及医学的内容还有捣药、升仙等，王小凤介绍安徽萧县圣村汉画像石中有玉兔捣药的形象<sup>[74]</sup>。杨金萍的《汉画像

石与中医文化》对汉代画像石与中医药文化的渊源作了系统总结,是该领域研究的唯一专著<sup>[75]</sup>。画像石这类艺术作品大多不是写实性的,显然不能成为了解医药状况的直接史料,但艺术来源于现实,它必然有某些现实模型或思想原型。因此这类研究虽然偏于文化视角,但对医药技术史也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外,出土文物中还有一些兽医、房中相关器具等。董珊介绍了1件私人收藏的西汉青铜马式<sup>[76]</sup>,其上有71处标明部位的铭文,并有一处“客主人”为穴位名,与《齐民要术》保存的传世相马术语颇多相同,且有5个部位术语亦见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相马经》。

出土先秦秦汉医药文物对于中医学理论渊源与学术发生发展源头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进行系统化、深入化、多学科综合研究十分必要,但目前研究的不足也很明显。其一是系统性的比较研究不足。由于出土文物分布零散且都是实体性器物,研究者很难接触某一类别的所有器物,仅靠考古报告或研究报告来研究显然有一定缺陷;一些物品从形制角度研究缺乏标准器和文献支持,仅从性能角度研究推论,难以落实到具体器物上<sup>[77]</sup>。其二是与医史文献研究成果的互鉴有待加强,如以往常说“针”源于“砭”,从器物而言固然如此,但此说也容易将早期砭石功能与后世刺激穴位的“针”相比类,目前研究认为腧穴概念形成于调气之微针——气针普及之后<sup>[30]8</sup>,而早期先民应用砭石时可能尚未形成系统的经络穴位知识。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科技考古的兴起,对先秦秦汉出土医药文物的研究有可能会越来越多地采用现代科技手段,这将会突破“文献-文物”的二重证据模式。如由于科技手段的介入,有学者提出“本草考古”的概念<sup>[78]</sup>,并且指出本草考古与植物考古一样都属于科技考古,更重视应用现代手段对出土的药物残留物进行提取分离和鉴定<sup>[79]</sup>。这类成果必然有助于认识早期药物的应用情况,只是未必能对应古代文献记载,因为古代医药知识的来源并不完全基于物质属性,有的可能基于哲理思维,但这两者也并非矛盾的。多学科、多途径的研究,将来一定会不断丰富关于早期医药学史的认识。

## 参考文献

- [1] 马继兴,周世荣.考古发掘中所见砭石的初步探讨[J].文物,1978(11):80-82,52.
- [2] 王雪苔.中国针灸源流考[J].中医杂志,1979(8):59-64,54.
- [3] 马继兴.山西村商墓中出土的医疗器具砭镰[J].文物,1979(6):54-56.
- [4] 贾海燕.略论战国至汉代医学中的科技应用成效:以楚地出土资料为主要对象[J].湖北社会科学,2015(4):192-198.
- [5] 潘界明.推拿与考古[J].按摩与导引,1995(5):34-33.
- [6] 张入文.古代医用砭石的应用[J].河南中医,2014,34(4):749-750.
- [7] 伍秋鹏.砭石类型与形制新探[J].中华医史杂志,2009(2):73-81.
- [8] 武贞.满城汉墓出土医疗器具概述[J].黄河黄土黄种人,2019(4):23-26.
- [9] 张立东.无孔骨针用途小考[N].中国文物报,1994-06-05(3).
- [10] 孟君,张大庆.大众医学史[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 [11] 和中浚,吴鸿洲.中华医学文物图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58.
- [12] 叶浓新.马头古墓出土铜针为医具论试证:兼论壮族先民的针灸疗法[J].广西民族研究,1986(3):102-107.
- [13] 钟以林,班秀文,黄瑾明.九针从南方来的实物例证:广西武鸣出土青铜针灸针初探[J].广西中医药,1987(3):33-36.
- [14] 陈嘉雯,王正.广西武鸣县出土针灸用具研究[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4,23(18):26-27.
- [15] 周言,魏宜辉.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所藏战国铜砭及其相关问题[M]//香港浸会大学系邵文伉俪人文中国

- 研究所.学灯:第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90.
- [16] 陈振中.先秦青铜生产工具[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374.
- [17] 伍秋鹏.早期医用金属针具初探[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14,37(4):113-117.
- [18] 蓝日勇.广西贵县汉墓出土银针的研究[J].南方文物,1993(3):64-66.
- [19] 钟依研.西汉刘胜墓出土的医疗器具[J].考古,1972(3):49-53,70.
- [20] 编辑部.金莲山考古新发现,可能改写针灸历史[J].中国针灸,2008(2):158.
- [21] 谢克庆,和中浚,梁繁荣,等.“西汉人体经脉漆雕”的价值和意义[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1996(1):36-38,55.
- [22] 马继兴.双包山汉墓出土的针灸经脉漆木人形[J].文物,1996(4):55-65,98.
- [23] 马继兴.双包山西汉墓出土经脉漆木人型的研究[J].新史学,1997,8(2):1-57.
- [24] 刘澄中.西汉涪水经脉木人考察[J].中华针灸医学杂志,1999(1):37.
- [25] 何志国,谢克庆,梁繁荣,等.人体经脉漆雕年代及相关问题考察[J].四川文物,1997(1):20-23.
- [26] 何志国.西汉人体经脉漆雕再考[J].四川文物,2000(6):6-11.
- [27] 李观荣,易群,张永玲,等.从双包山与马王堆相关背景探讨经脉漆雕年代[J].中华医史杂志,2001(2):119-121.
- [28] 张雷.老官山汉墓文物所见腧穴问题初步研究[J].中医文献杂志,2021,39(1):4-7.
- [29] 梁繁荣,王毅,李继明.揭秘敝昔遗书与漆人:老官山汉墓医学文物文献初识[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31-50.
- [30] 黄龙祥.黄龙祥看针灸[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 [31] 林乾良.河姆渡遗址的医药遗迹初探[J].中华医史杂志,1982(4):254-256.
- [32] 辛智科.略谈考古发掘中出土的药物[J].陕西中医,1989(9):428-429.
- [33] 耿鉴庭,刘亮.藁城商代遗址中出土的桃仁和郁李仁[J].文物,1974(8):54-55.
- [34] 耿鉴庭.从安阳殷墓出土的梅核谈起[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78(2):45-47.
- [35] 张海鹏.宗教与医学之间的罗布泊“墓葬麻黄”[J].中华医史杂志,2020,50(3):131-137.
- [36] 夏雷鸣.古楼兰人对生态环境的适应:罗布泊地区墓葬麻黄的文化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1997(3):115-130.
- [37] 王兴伊.“麻黄”药用及文化遗存考辨[J].中医药文化,2018,13(1):28-38.
- [38] 姚智远,徐婵菲.先秦两汉花椒的用途及文化意义[J].农业考古,2008(1):168-176.
- [39] 杨俊峰.殷墟“亚长”墓随葬花椒葬俗浅议[J].农业考古,2012(4):8-12.
- [40] 文物出版社.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动植物标本的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21.
- [41]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 [42] 何祚成.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药物[J].新医药学杂志,1973(2):35,41-42.
- [43] 张厚墉.浅论韩城姚庄坡东汉墓出土的薄荷、薏苡和枣核[J].考古与文物,1983(3):68-72.
- [44] 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J].考古,1984(3):222-230,289-292.
- [45] 王维一.南越王墓出土五色药石研究[J].文物世界,2018(3):13-16.
- [46] 王玉清.潼关吊桥汉代杨氏墓群发掘简记[J].文物,1961(1):56-66.
- [47] 唐金裕.汉初平四年王氏朱书陶瓶[J].文物,1980(1):95,105.
- [48] 刘卫鹏.“五石”镇墓说[J].文博,2001(3):24-29.
- [49]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考古论集: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纪念[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166.
- [50] 李敏生.山东巨野县西汉墓出土丸状物的属性问题[J].考古,1983(12):1137-1138.
- [51] 彭华胜,徐长青,袁媛,等.最早的中药辅料炮制品: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木质漆盒内样品鉴定与分析[J].科学通报,2019,64(9):935-947.
- [52] 傅金泉.中国古代酿酒遗址及出土古酒文化[J].酿酒科技,2004(6):90-92.
- [53] 马智全.汉代西北边塞的“市药”[J].简牍学研究,2018(1):87-95.

- [54] 孙机.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 [M]. 修订本.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
- [55] 管理, 武家璧, 王楚宁, 等. 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漆木器 [J]. 文物, 2018(11):27-56,1.
- [56] 王烨燃, 袁媛, 徐长青, 等. 海昏侯汉墓“医工五禁汤”命名考辨 [J]. 中华医史杂志, 2017(3):145-148.
- [57] 魏嘉臻, 管理. 海昏侯医工盘铭文小释 [J]. 南方文物, 2019(6):170-171,180.
- [58] 张勋燎, 白彬. 中国道教考古:1[M]. 北京: 线装书局, 2006:54-55.
- [59] 刘卫鹏. 汉代镇墓瓶所见“神药”考 [J]. 宗教学研究, 2009(3):1-7.
- [60] 南京博物院. 江苏仪征石碑村汉代木槨墓 [J]. 考古, 1966(1):14-20,7.
- [61] 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 巨野红土山西汉墓 [J]. 考古学报, 1983(4):471-499,531-542.
- [62] 耿鉴庭, 耿引循. 长沙出土的两件古代制药工具 [J]. 新中医, 1978(3):57,47.
- [63] 南京博物院. 铜山小龟山西汉崖洞墓 [J]. 文物, 1973(4):21-22,46,23-35.
- [64] 曹晖, 廖果. “一带一路”中医药文物图谱集 [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6:21-23.
- [65] 国家文物局.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 陶瓷卷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8:195.
- [66] 和中浚. 略论古代熬药温药器 [J]. 四川文物, 1998(3):27-31.
- [67] 王凯旋. 秦汉生活史话 [M]. 沈阳: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7:172.
- [68] 满泽阳. 古代漏斗功用初考 [J]. 农业考古, 2018(3):148-155.
- [69] 刘敦愿. 汉画像石上的针灸图 [J]. 文物, 1972(6):47-52.
- [70] 叶又新. 神医画像石刻考 [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1986(4):54-60.
- [71] 叶又新. 试释东汉画像石上刻划的医针: 兼探九针形成过程 [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1981(3):60-68.
- [72] 罗曼. 山东嘉祥武梁祠汉画像石医事考略 [J]. 中医文献杂志, 1999(2):4-5.
- [73] 康兰英, 王茂林, 史志宏. 陕北汉画像石与医药考古 [J]. 陕西卫生志, 1985(2):60.
- [74] 王小凤. 圣村汉画像石略述 [J]. 中原文物, 2004(5):71-74.
- [75] 杨金萍. 汉画像石与中医文化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0.
- [76] 董珊. 乐从堂藏铜马式考 [M]// 刘钊.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 第7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248-278.
- [77] 应艳新, 郑玮瑶, 郑洪. 先秦秦汉出土涉医砭石和针具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展望 [J]. 浙学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3, 47(2):129-136.
- [78] 黄璐琦. 本草学研究的二重证据: 从本草文献考证到本草考古 [J]. 科学通报, 2018,63(13):1164-1171.
- [79] 彭华胜, 袁媛, 黄璐琦. 本草考古: 本草学与考古学的交叉新领域 [J]. 科学通报, 2018,63(13):1172-1179.

( 本文编辑 黄晓华 )